

“刘易斯拐点”的中国现实判断

吴 华

(财政部 财政科学研究所, 北京 100142)

摘 要: 文章对中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进行了探讨, 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已进入关键时期, 转型期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点, 但不符合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基本条件。要实现劳动力有序有效转移, 应进一步完善农村劳动力政策: 公共财政支持建立农村青年技能培训和转移就业综合服务体系; 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 逐步构建城乡统一、全国一致的基础性社会保障制度; 率先推动实现区域内城乡居民间基本公共服务同质同价; 实现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劳动者向工业劳动者的真正转变。

关键词: 转型; 刘易斯拐点; 农村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 F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 (2012) 04-0050-05

The Judgment on China's Reality by Lewis Turning Point

WU Hu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Fiscal Science, Ministry of Finance, Beijing 100142, China)

Abstract: The transfer of rural labor in China is quite complicated in transformation period and does not satisfy the basic conditions of Lewis dual economy theory. The transfer of rural labor has entered key period at present. Rural labor policy shall be further improved to transfer labor force effectively and in sequence; public finance support shall be given to establish to comprehensive service system of training and transfer employment; accelerate urbanization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transfer of more rural surplus labor force; gradually establish rural-urban and national unified basic social guarantee system and promote and realize the same quality and value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of rural and urban residents within the region, and realize the re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labor force to industrial labor force.

Keywords: transformation; Lewis turning point; transfer of rural labor;

2008 年金融危机全球爆发在并蔓延到中国。在此背景下, 农民工回乡创业出现新高潮, 部分产

收稿日期: 2011-11-17; 修订日期: 2012-05-22

作者简介: 吴华 (1972-), 安徽金寨人,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区域经济、农村减贫与发展。

业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2009 年东部沿海出现局部“民工荒”现象，2010 年“民工荒”现象进一步向全国扩展。“民工荒”代替“民工潮”的出现引起了学术界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阶段性的讨论，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已经跨越“刘易斯第一拐点”，如张墨宁等认为，过去 30 多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劳动人口所占比例持续上升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通过高储蓄率保证了资本存量的不断增加，但是这一增长动力在 2004 年后开始弱化，目前中国已经越过了“刘易斯拐点”，中国或将出现劳动力短缺时代^[1]。但也有学者认为判断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还为时尚早^[2]。“民工荒”现象背后更多的是中国农村劳动力政策、工业化政策、城市化政策等经济社会政策存在的缺陷，可以说近年出现的“民工荒”有各种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要判断“刘易斯拐点”在中国是否到来，首先需要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与特点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再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阶段进行探讨。

一、关于“刘易斯拐点”概念的阐述

“刘易斯拐点”由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Arthur Lewis）的二元经济理论引申而来。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人口众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传统乡村农业部门和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现代城市工业部门。转型初期，经济增长就是在农村边际生产率极低的情况下，现代城市工业部门以固定工资率吸收农村劳动力的过程，在一定时期劳动力是一种无限供给的状态，直到农业边际生产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民家庭收入为止，即出现“刘易斯拐点”；转型中后期，现代工业部门通过使用无限供给的农业劳动力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并转化为工业进一步增长的驱动力，不断瓦解传统乡村的收入分享制的就业特征，深化社会分工，推动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3]。

拉尼斯和费景汉于 1961 年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修正，并提出了劳动力转移存在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业部门存在边际生产率为负数或零的剩余劳动力，农村绝对剩余劳动力完全转移的转折点，被称为“刘易斯第一拐点”。第二阶段，农业部门仍存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小于平均收入的剩余劳动力，工业部门必须提高工资来补偿劳动力离开农业的机会损失，否则会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从而迫使工业部门的工资率缓慢上涨。这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将会影响农业的发展。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再转移，农业边际生产率逐渐等于平均收入，这意味着第二阶段的转移接近结束，出现第二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二拐点”，也称为“产业化点”。此后，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第三阶段，农业中边际生产率大于平均收入的劳动力开始转移，以推动各产业生产率水平的均等化。这时，农业已经资本化，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所面临的劳动供给曲线均为正斜率。只有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率，才会为转移农业劳动力创造基础条件。

中国学者蔡昉把刘易斯转折点定义为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供给增长速度，工资开始提高的情形。此时，农业劳动力工资尚未由劳动边际生产率决定，农业与现代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仍然存在差异，而农业部门与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都由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决定，两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相等阶段的到来，称作商业化点，这时才意味着二元经济的终结^[4]。由此可见，蔡昉定义刘易斯转折点更接近拉尼斯和费景汉界定的“刘易斯第一拐点”的概念。

二、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

受中国人口增长惯性的影响，农村劳动力仍处于持续增加时期，传统农村经济尚未完全实现专业化分工，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潜力仍然巨大。转移就业仍是农村劳动力增加收入、改善家庭生活状况的主要手段。但是，转型中后期农村劳动力转移特征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农村劳动力将更深层地参与经济社会转型。

1. 农村家庭中非农业经营户持续增加，反映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呈增加态势

表 1 显示，近几年我国的农村纯务农户近似为稳定的数值，虽然由于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

务农户出现过短暂的增加,但是务农收入与非农收入差距过大,影响着农村居民务农积极性。以农业为主要生计来源的家庭在农村仍占少数,而兼业户增加显著。无论是以农业为主的兼业户,还是以非农业为主的兼业户,稳定增加趋势都非常明显,同期纯非农业户上升更快。这基本反映了当前农村家庭状况变迁的事实,即新一代农村劳动力逐渐成家立业,从父母家庭分离出来,成为新的农村户。表1还反映了农村非农产业正渐进发展,成为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

表1 我国部分年份农户经营状况

户/村

指标名称	2000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年末总户	410.28	445.36	458.13	481.91	500.70	516.36	521.91	530.94
纯务农户	193.64	201.62	201.22	196.26	207.43	205.47	201.56	197.70
农业为主兼营户	117.65	121.90	129.50	138.52	133.11	137.25	137.43	142.52
非农业为主兼营户	70.33	76.87	83.30	89.33	91.41	99.63	98.41	103.41
纯非农业户	22.03	35.05	34.95	46.28	55.24	56.61	67.17	69.21
其他户	6.62	9.92	9.15	11.51	13.51	17.40	17.34	18.11

资料来源: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汇编[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表2显示,2000~2009年虽然每村劳动力共增加200多人,但是同期外出劳动力也共增加了近200人,这意味着增加的劳动力极少留在农村就业,大多数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可见农村确实成为新生劳动力的培养地。而新增加劳动力近乎全部外出务工,意味着在未来二三十年“三农”将发生根本性改变,农村居住人口实质性减少的进程将加快,现代农业推进将加速,现代乡村建设面临快速转型。

表2 农村劳动力外出情况

人/村

指标名称	2000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年末劳动力总数	814.1	886.9	908.9	988.6	1005.5	1039.4	1045.1	1072.2
外出劳动力人数	125.8	196.9	213.7	256.5	267.6	297.3	307.7	323.0
出乡县内就业	43.3	66.7	69.4	81.2	81.7	95.8	99.9	107.3
出县省内就业	36.1	56.6	63.1	68.7	73.7	84.0	85.9	91.2
出省国内就业	45.8	71.2	78.8	102.1	106.9	111.4	115.4	117.7
境外就业	0.6	2.4	2.4	4.5	5.3	6.2	6.5	6.9

资料来源:同表1。

2. 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就业仍呈现季节性、周期性特征,离实现完全转移尚远

从表3可以看出,近几年农村外出劳动力工资水平逐年上升,收入从2003年的6968元增加到2009年的12740元,农村劳动力收入水平持续上升,农村劳动力渐次转移引起农村家庭的生产生活条件逐步改善。同时外出农村劳动力平均就业时间基本稳定,农村劳动力有近三个月的时间停留在农村,农忙、待业、回家过年等是影响外出劳动力从业时间的主要因素。因此,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就业仍呈现季节性、周期性特征,很难实现家庭式整体迁移,尚没有完成市民化进程,也没有真正转化为产业工人。

表3 2003~2009年我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情况

指标名称	单位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农村人口	人/户	3.81	3.78	3.77	3.76	3.78	3.77	3.74
农村劳动力	人/户	2.67	2.68	2.84	2.75	2.75	2.73	2.65
全家外出从业劳动力	人/户	0.53	0.57	0.68	0.60	0.65	0.65	0.71
外出劳动力平均从业时间	工日/人	261	265	267	270	269	265	267
外出劳动力平均年收入	元/人	6968	7012	7532	8512	10030	10747	12740

资料来源:同表1。

3.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区域基本稳定,省内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点,区域内劳动力资源配置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

表2显示,农村劳动力县内、省内、省外就业基本三分天下,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县域经济发展、主体功能区建设、城市群建设等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区域性转移的重要因素。未来一段时期,以区域经济中心为重点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仍是改善农村劳动力转移环境的重要内容。另外,境外就业有一定增加,这与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有一定关系。随着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高,以及农村劳动力“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促进境外就业,维护海外务工劳动者的权益,将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内容。

4. 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大多数外出务工,意味着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新的阶段

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80后和90后农民,这批人在外出务工的1.5亿人中占到60%,约有1个亿。他们离开学校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和土地等不是很熟悉。与此同时,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而目前社会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新生代农民工年龄一般为18~25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新的阶段。

5. 产业结构低端化使企业缺乏对农民工进行培训的动力,人才储备不足导致农民工供求呈现结构性短缺

中国企业缺乏核心的制造技术,在研发、设计、营销等高端价值环节不具竞争优势。很多制造企业在国际分工环境中顺势选择了生产加工和装配等环节,通过低端的代工方式获得微薄的利润。在制造业结构低端化的情况下,企业缺乏对员工进行技术性培训的压力,导致技术人才的储备严重不足。当企业扩张和技术发展需要技术型工人时,供应不足的问题立刻暴露出来。同时,要发展第三产业,用技术改造劳动密集型行业,实现农民向工人或服务人员的角色的转变,必须有一个条件——农村劳动力实现自身的改造。这不仅包括文化水平的提高,还包括实际工作技能的加强,甚至包括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的改变。然而目前我国农民工的总体素质较低,如果没有或不能顺利地实现这个转变,劳动力短缺现象将不可避免。

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对劳动力转移影响极大: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择业的范围广,就业的路子宽,谋生的渠道多,既能适应劳动密集型工作,又能适应技术密集型工作;相反,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只能在极其有限的地域和产业范围内提供劳动。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大都属于“体力型”劳动者,通常进入的大多是清洁、建筑、服务等行业,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较低,很难开拓新的就业门路、创造新的工作机会,也难以适应城镇的工作和生活。

三、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现实阶段的特殊性分析

1. 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不符合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的基本条件

由于中国经济的特殊性,现有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实践。我们也不能单纯根据西方理论来判断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阶段。

首先,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部门不完全符合二元经济的特点,二元经济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实际上,不仅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是吸纳中国农村劳动力的重要渠道,城市部门还存在非正规就业部门,农村还存在大量的非农产业,它们是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主要选择。一方面,中国以农村人口为主体的人口总量庞大,而另一方面,城市本身同样有难以解决的就业问题,难以通过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办法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尽,也难以发展起极其庞大的工厂企业吸收如此众多的劳动力以被雇用的形式就业。由此研究和展望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不可全部套用以西方国家经验为理论基础的二元经济理论。中国人口特征决定了城市现代经济尚无法吸收全部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是中国城市非正规就业部门和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未来一

段时期，这两部分仍将长期存在，并有可能演化出中国现代化的新逻辑。

其次，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并不能完全由农业边际生产率的提高得到解释。转型时期，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必然现象，不存在完全停滞的传统农业经济，所以，单纯从农业边际生产率的角度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阶段性存在片面性。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演化过程表明，因劳动节约型和土地节约型技术的进步推进的农业现代化，是农业剩余得以持续存在的重要保障，是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的重要推力。

最后，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着很大的制度性障碍。中国存在难以消除的二元制度体系，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障碍。中国碎片化的制度结构，妨碍了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妨碍了农村劳动力在区域内部及区域之间的正常流动。然而，中国独有的制度体系是约束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框架。未来一段时期，消除二元制度体系仍存在实质性的障碍，这意味着中国农村劳动力存在与其他国家不同的转移逻辑。

2.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时期

之所以作出这一判断，笔者主要参考了三个方面的情况。一是传统制度变革后，中国缺乏统一的制度框架，而现在这种缺失所带来的弊端远大于收益，成为影响中国转型的制度障碍。主要表现为人口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等基础性社会运行机制不统一，成为农村劳动力实质性转移的阻力。转型中后期，重建现代体制是实现转型的基本环节，也是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机制。二是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迁，农村劳动力“半城市化”转移的深入推进，只是把农村劳动力看作城市化、工业化的主要劳动力源泉的思维模式，已经严重阻碍工业化、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农村劳动力还应该是城市化成果的分享者，是居住城市的基本组成部分。转型中后期，大部分农村劳动力转化为城市市民，是转型的必然进程和基本表现。西方国家农村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同步实现了向市民的转化，而中国开辟了非同步转化的路径，但是现在到了必须转化的阶段，只有这样，才能根本实现转型。三是近几年，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机械化进程迅猛发展。地域条件、农业结构等决定了中国农业的机械化路径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技术路线正在发生积极演化，但是还没有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技术变迁模式。同时，现代乡村建设尚缺乏合理的路径，与现代农业相关的体制机制尚未形成，尚无法论证现代农村可以容纳多少劳动力，以及应该与城市建立怎样的发展关系。这意味着农业现代化、现代乡村建设已经进入关键时期。

农村劳动力实质性转移所需要的时间不仅取决于农村生产生活基本情况的变化，如现有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农村居住环境和就业环境的变化；更主要取决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创造的可容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空间，以及城乡收入水平差异程度和区域内城乡之间生活环境的差异程度；还取决于政府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的施政理念和实施政策；也取决于转型过程中发生的价值观念变迁。尽管2003年以来中国局部地区出现“民工荒”现象，农民工工资水平呈现上升趋势，政府也逐渐放松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限制，并加大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支持力度，但是中国目前仍然有超过3亿多的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仍在扩大，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扩大。城乡之间的生产生活水平差异还没有真正进入缩小的通道，这不符合转型中期阶段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仍十分漫长。

四、促进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的政策建议

中国需要重新思考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问题。一方面，从制度重构的角度科学设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体系；另一方面，从技术进步、产业发展、区域布局、人口政策等发展的角度重新勾画中国的发展蓝图，规避“中等收入陷阱”、“老龄化陷阱”等困境。

第一，逐步构建城乡统一、全国一致的基础性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劳动者向工

(下转第77页)

- [6] 同 [5].
- [7] 杜鹏, 尹尚青. 长寿与经济社会发展 [C]. //中国老年学学会. 长寿理论与实践——“长寿与发展高峰论坛”论文选, 2008: 4-5.
- [8] 同 [7].
- [9] 秦俊法. 中国的百岁老人研究 IV. 2009, 上海成为中国长寿之乡 [J]. 广东微量元素科学, 2007, (12).
- [10] 刘汴生, 沈凯, 刘浩等. 中国百岁老人健康状况的研究 [J]. 老年医学与保健, 2003, (4).
- [11] 姚新明, 古碧清. 中国寿乡行 [M].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5.
- [12] 萧振禹, 原野, 张秋霞等. 中国彭山长寿乡研究 [J]. 老龄问题研究, 2005, (6).
- [13] 战捷. 长寿研究任重道远 [C]. //中国老年学学会编. 长寿理论与实践——“长寿与发展高峰论坛”论文选, 2008: 16-19.
- [14] 同 [13].
- [15] 于闻. 2007 国际健康健美长寿论坛在京举行 [EB/OL]. <http://news.sina.com.cn/c/2007-11-16/083312913988s.shtml>, 2012-03-12.
- [16] 同 [1].
- [17] 李正杰. 世界著名长寿之乡——巴马长寿研究 50 年文献选编 [M]. 香港: 展望出版社, 2010: 415-416.
- [18] 中国老年学学会区域长寿标准专家委员会. 区域长寿标准 [Z]. //中国老年学学会. 中国老年学学会区域长寿标准研讨会文集, 2006.
- [19]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老龄工作统计指标体系 [M],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4: 122-123.
- [20] 秦俊法. 中国的百岁老人研究 II. 百岁老人的死亡率、生存率和发展趋势 [J]. 广东微量元素科学, 2007, (10).
- [21] 刘贵平. 高龄老人死亡风险的社会经济因素分析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4, (S1).
- [22] 刘汴生, 沈凯, 刘浩等. 中国百岁老人人口动态及地区分布 [J]. 老年医学与保健, 2003, (1).

[责任编辑 冯 乐]

(上接第 54 页)

业劳动者的真正转变。构建区域内城乡劳动力平等就业、同等社会福利的基础性制度框架, 率先推动实现区域内城乡居民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同质同价。以公共福利均等化为政策设计的立足点, 逐步形成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第二, 加快城市化进程。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城市化的有效拉动, 第三产业的发展也与城市化息息相关, 只有城市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 才能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 从而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顺利转移。为此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 要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 坚持因地制宜的城市化道路。由于中国大城市, 特别是特大城市, 吸纳劳动力的潜力已十分有限, 应依据各地区实际情况, 重点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中型城市, 以吸纳农村富余人口。同时积极发展小城市, 尤其要引导发展农村小集镇, 实现农民的就地转移。

第三, 公共财政支持建立农村青年技能培训和转移就业综合服务体系。使得中学教育与职业教育有效衔接, 帮助农村青年掌握职业劳动技能。建立农村青年就业预备制度, 为他们进入城镇就业创造条件, 也为城市补充后备劳动力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 [1] 张墨宁, 巴曙松. “刘易斯拐点”是经济转型的契机 [J]. 南风窗, 2011, (17).
- [2] 钱文荣, 谢长青. 从农民工供求关系看刘易斯拐点 [J]. 人口研究, 2009, (2).
- [3] 刘易斯. 二元经济论 [M]. 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
- [4] 蔡昉. 关于中国人口及相关问题的若干认识误区 [J]. 国际经济评论, 2010, (6).

[责任编辑 冯 乐]